

大模型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现实审思、 范式重构及实践路径

梁 丽

(兰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兰州 730101)

[摘要]大模型掀起的数字化浪潮,深刻影响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作为新兴技术样态,大模型不断内嵌渗透到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场域中,阐释其现实条件、挑战及意义显得尤为重要。大模型具有高度模仿人类思维的技术能力,所带来的思维模式创新、平台载体升级、场域空间延展等重构了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范式。基于大模型的技术机理及其应用呈现的风险样态,须以主体牵引、技术支撑、协同治理为纾解策略,力求在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过程中,提升高校领导干部的数智能力、构建高校智能化网络防控体系、强化高校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体系和健全高校全过程执行的制度,从而提高大模型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效能。

[关键词]大模型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创新路径

[中图分类号] G641; G647.2; G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711X(2026)10-0042-04

doi:10.3969/j.issn.2096-711X.2026.10.014

[本刊网址] <http://www.hbxb.net>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重视运用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水平。”他还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当下,伴随着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升级与完善,人工智能的发展进入了以 ChatGPT、DeepSeek、Sora 为场景媒介的大模型时代,对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其主要涵盖了以算法黑箱与价值观渗透、信息茧房与认知极化、虚假信息与认知操纵为主要内容的技术性风险,以平台资本的技术垄断为主要内容的制度性风险,以师生数字素养鸿沟、青年亚文化抵抗为主要内容的主体性风险等。基于此,这要求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者深刻把握大模型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形势,正确审视大模型内在机理,深刻把握技术特征,科学透视内嵌风险,继而提出大模型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智能治理新范式。

一、大模型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现实审思

大模型时代是一场关乎全局、影响广泛的革命性嬗变,其主要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媒介、以开源型大模型为平台载体、以超强算法为特征。大模型技术能够伴随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全过程,既创新了治理场景,也使得治理效果呈现倍增效应。面对这种情况,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应该紧跟时代趋势,牢牢抓住时代赋予的机遇。基于此,全面把握现实条件、挑战及意义是大模型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不可或缺的观察界标、检视窗口及研析视阈。

(一)大模型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现实条件

伴随着以大数据、大模型、算法推荐等人工智能底座技术的快速发展,大模型无疑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同理,大模型时代为高校开展意识形态风险治理创造了历史性机遇。大模型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具备

独特的政策优势、资源禀赋与创新潜力。上述优势条件为大模型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提供坚实的发展动能。其一,政策优势。为了应对大模型时代高校意识形态的治理,一方面,党和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及时出台了相关政策制度。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构建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防线”,教育部配套出台了《高校大模型应用安全管理指南》。另一方面,国家不断完善法律体系。随着数智时代深入推进,国家及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法规,一系列法律的出台构建起“数据主权—算法安全—内容合规”三位一体的法律框架。尤其是2023年实施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管理办法》,其明确规定高校使用境外大模型必须通过国家安全审查。其二,技术载体。大模型时代,算法推荐、开源大模型作为一种特殊的技术资源,为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提供了技术条件,而大数据、3D 影像、VR 网络虚拟等现代化技术迅速发展,为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提供了载体平台。目前,信息传播的速率大幅度提升,以5G为例,传播速率理论上可达到2200+MBPS,能够有效支撑红色基因资源以高清视频的形式呈现,使得承载红色基因的人物、事件、物件等文化资源基本上实现无时差无场域传递。具体而言,数字图像技术可以使主流意识形态内容通过数字化方式进行记录与传播;大模型平台可以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精准推送与呈现。其三,创新潜力。随着大模型迭代更新及大模型技术迅速发展,其为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提供了新思维和新方式。尤其是一些国产化的大模型平台出现,极大程度上降低了西方意识形态输出与传播。还包括国内部分高校自主研发的“意识形态安全态势感知平台”等,可以实时检测文本、图像、视频中的隐喻元素,有效实现意识形态风险管控。

收稿日期:2025-12-18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5年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大模型时代甘肃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逻辑机理及实践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5QN24)。

作者简介:梁丽(1992—),女,甘肃兰州人,兰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二)大模型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现实挑战

作为新兴技术样态,大模型不断内嵌渗透到高校意识形态治理场域中,呈现出异化、操纵、结构和缺位等多重现实样态。大模型给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带来诸多挑战。其一,大模型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面临算法黑箱与数据操控的风险。大模型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尤其是网络舆情生成与传播的数智技术支撑,加速了认知茧房现象和沉默螺旋效应,为高校意识形态的应对与引导带来了风险挑战。大模型的深度学习机制缺乏透明性,导致意识形态偏差难以溯源。其中,认知茧房效应的存在会误导高校师生只相信或认同和自己观点相符的信息,继而忽视了不同观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性。而在大模型时代,由于大模型软件的智能生成及智能算法的精准推荐,往往会加剧认知茧房效应,消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在大模型时代,沉默螺旋效应呈现出即使自己赞同也会选择保持沉默。该效应会促使少数不正确的观点传播,但也会被忽视。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意识形态风险治理难度。其二,大模型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面临治理机制与技术革命的落差。面对大模型技术盛行,国家已颁布了法律条例,出台了制度机制。但现行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未细化高校常规管理规范,导致了治理实践的真空。面对大模型这种新型事物,高校管理机制还有待完善,尤其是高校宣传部、网信办、教师工作部、学工处等部门权责边界不清。由于大模型的隐匿性,现在对通过大模型散布言论的追踪技术难度很大,即使是追踪到相关责任主体,有时很难证明其主观故意,现行法律规则很难追究其法律责任。其三,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面临认知滞后与能力不足的风险。在大模型时代,高校很多部门未能形成明确的责任分工,导致意识形态阵地建设与管理工作中存在较多“交叉地带”,难以按照大模型时代的技术特征及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诉求完成工作任务,影响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有序推进。与此同时,由于大模型技术要求高、迭代快等,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还存在着一定的主体性风险,例如,学生缺乏数字素养,教师驾驭 AI 技术的能力不足,难以识别 AI、大模型生成内容的意识形态陷阱,很难有效识别技术方案中的意识形态风险;青年亚文化抵抗,青年通过 AI 创作“恶搞”“解构”类内容,对红色文化二次元化等,继而挑战传统教育话语权威。

二、大模型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范式重构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由不同要素组合而成的集合体,该集合体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过程本质上体现为一个系统性的集成过程。而作为高度模拟人类思维的技术力量,大模型具备超越传统模式的能力,并有望重塑治理范式。大模型影响高校意识形态具有内在逻辑,即技术与方法的双重耦合。尤其在技术逻辑方面,大模型通过数据殖民、算法驯化、人机共谋等,将实现对高校意识形态进行隐性编码,重构高校意识形态的生成路径。

(一)大模型驱动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思维革新

一方面,大模型提供精准化思维理念。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中,精准化的传播内容和传播对象尤为重要。大模型凭借其智能化搜索与记忆功能,能够精准对接教育用户的认知需求与知识需求,并在此过程中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内容。同时,大模型通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传播细节的精准强化以及对教育对象的精准把握,能够凸显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真实性、提升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有效性以及培养

教育对象的学习惯习。另外,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离不开青年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大模型依托其数据、算法与算力优势,既实现对青年学生价值导向等进行差异化整合与系统性分析,在算法分析与推荐中不断建构认同,也能够直击青年大学生的灵魂深处,引发他们的价值共鸣,继而奠定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基础。另一方面,大模型提供多元化思维理念。过去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更多依靠经验判断,而在大模型时代可以实现从经验判断到全息感知,体现为大模型可以对高校意识形态风险实现多维识别,包括对校园舆情数据,教学行为数据、学术成果数据等信息,在此基础上构建意识形态风险的治理模型。与此同时,大模型可以突破原有的局部治理缺陷,实现全域生态重构。大模型可以构建群体智能范式,建立学生自律机制。例如,学生在大模型平台上传与主流意识形态、思想政治教育等相关内容可以获得相应奖励,形成“贡献—激励—传播”的正向循环生态。总之,大模型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能够实现从“事后灭火”转向“事前算火”,从“一刀切管控”转向“精准滴灌”,从“封闭防御”转向“开放共治”。

(二)大模型搭建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平台载体

一方面,大模型带来开放式平台。现在认可度高的几款大模型特色和优势体现为开源,其源代码都是公开透明的,尤其是 DeepSeek 的发展模式突破了传统 AI 模型开发范式,对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带来更多现实助益,这意味着支撑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平台可以更加便捷地运用 AI 技术,推动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实现创新发展。且在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中,通过借助开源的大模型平台,青年大学生可以形成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氛围,进行思想对话与观念碰撞,并分享彼此的看法与经验,一起探讨意识形态工作的风险与挑战。开源大模型能进一步提升高校意识形态管理平台的透明度,使得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过程变得更加公开,增加了高校师生的信任与认同。另一方面,大模型为开放式平台增加力量。基于大模型交互式对话特质,高校可以实现全天候的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在大模型的知识库中不断植入并更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果、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伟大成就,就青年大学生关注的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等内容进行强化。此外,在高校思政课教学平台中,应充分发挥大模型作用,运用大模型识别敏感词、检测理论偏差、情感分析等功能进行分析教师授课内容、学生听课感悟等,从而打造连接多元主体的协同平台。为提升意识形态风险治理水平,多所高校之间可以利用大模型建立安全数据共享平台,尤其在特定区域内,数据共享平台可以使错误思潮传播的预警准确率大幅度提升。总之,运用大模型构建的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平台,可以促使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进入“智慧化”治理阶段。

(三)大模型拓展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场域空间

其一,大模型能够为高校宣传网络空间治理提供技术支撑。目前,在高校思想宣传网络空间中,存在着部分程度的网络诈骗、网络戾气、网络暴力、网络侮辱等不当行为。为有效治理这些网络空间乱象,国家不断完善网络生态治理规范。往往是制度规范略滞后于这些网络乱象,现在高校可以借助大模型等类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在人机互动中对有可能出现意识形态风险的用户专门推送相应的网络法制宣传和相关政策知识,提前进行预警与提醒,继而降低其违规风险。其二,大模型提供独特且强大的多功能应用生态。高校开展意识形态风险治理,必须贯穿高校工作各个领

域。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借助大模型多场景生态的适应能力,也就是在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不同空间中运行并有效发挥作用的能力,以实现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和意识形态风险治理。在不同的生态场景中,大模型可以分析学校师生的意识形态倾向,给学校相关部门提供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大模型还可以强化学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宣传,实现宣传信息的多样化传播,并将这些宣传内容智能化生成为形式更加多样的文案、图片和视频,以吸引青年大学生进行关注与传播。继而实现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润物细无声”的良好效果。其三,运用大模型打造智能空间。以大模型为核心技术支持的VR/AR等图像技术打造沉浸式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空间,带领大学生可以直观感受革命历史场景和红色文化资源,帮助他们加深对这些知识的理解。同时;还可以构建多模态意识形态认知生态,借助大模型精准识别与学校日常工作相关的学术文献、政策文件等海量数据,从中精准识别“新自由主义”“泛娱乐化”等不良思潮,构建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防火墙。

三、大模型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实践路径

以问题解决和实践指向为归宿,推动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适应大模型时代,主动求变、积极应变。面对大模型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挑战,要不断提升高校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完善高校智能化网络防控体系、强化高校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及健全高校全过程执行的制度,不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成效,确保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一)主体牵引:提升高校领导干部的数智化领导水平

一方面,要善于将大模型技术融入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全过程。在大模型时代,“机器智能”与“人类智慧”不是相互抵牾的对立关系,而是可以实现交流互鉴、和谐共生。为此,高校领导干部要积极参与大模型数据获取与交流等培训,开展运用大模型进行快速检索、内容输出、意识形态风险鉴别等训练,夯实领导干部运用大模型的基本功。领导干部要提升关于大模型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深度思考与研究等能力,主动构思与大模型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相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大模型治理培训。高校领导干部要想提升运用大模型的能力水平,参加专业培训是必要的手段之一。为此,高校要定期举行技术培训,安排领导干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思政骨干等人员参加对于大模型技术的掌握与应用,提升其数据收集、处理、分析、判断和利用的能力,为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提供支持。有了这些技术的加持,高校参与意识形态工作队伍水平也能得以提升,通过大模型的“个人画像”精准地掌握高校师生的“信息需求”,进一步根据这些需求提供优化方案,针对性地开展相关工作,以提升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水平。

(二)技术支撑:构建高校智能化网络防控体系

一方面,构建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一体化防控机制。针对大模型时代意识形态风险智能化遁形与隐匿性的特征,高校应充分运用大模型技术着力构建高速泛在、云网融合、智能一体、安全可控的意识形态风险防控体系,发挥数字话语、技术和文化等新技术、新手段赋能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尤其面对意识形态风险高发的领域,要发挥大模型技术对网络舆情的精准预测、精准研判、精准治理的科学引导及网络舆情危机的即时化解的优势。根据常态化防控需要,应建立集意识形态风险识别、研判、预警、监测、防控和治理的一体化体

系,筑牢校园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网,构建清朗校园网络空间。与此同时,思政课作为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主要阵地,要将大模型技术嵌入思政课教学体系。高校思政课教师要善于通过大模型发现和分析学生的网络信息足迹,学会对这些信息读取与分析、整合与运用,在此过程中力争对学生的意识形态表现进行“精准画像”。由此,精准选择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运用分众化、差异化的方式方法对学生实施“精准滴灌”,用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和引导青年成长成才。另一方面,加强技术防控的保障力度。要使大模型技术在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过程中发挥应有作用,高校就需要加大对大模型技术的投入,并结合本校实际情况开展针对性的二次研发。重点是投入成本全面拓展深度学习、语音识别、智能搜索、推荐算法等深度嵌入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与传播领域,持续不断突破实践困境与技术瓶颈,推进以大模型技术为支撑的意识形态风险治理体系升级。

(三)协同治理:强化高校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体系

一方面,建立多方力量协作机制。只有建立政府部门、企业、家庭、高校师生积极参与,高校各部门各司其职的智能化意识形态风险治理机制,才能最大程度发挥大模型的赋能作用,构筑起智能化高校意识形态风险的“防火墙”,将错误思潮言论阻断于高校师生视野之外,有效抵御当下的意识形态风险。要基于大模型的技术优势,建立多方协作沟通机制,定期举行政府、学校与企业的多方联系会议,就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交流,为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提供政策和技术支持。尤其在学校驻地党委和政府的政策支持下,学校联合相关企业围绕大模型与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技术研发与创新,以确保高校运用大模型开展意识形态风险治理更加具有精准性。与此同时,也应协同完善人才培养。高校应与企业开展深度合作,依托高校的教育优势为企业参与大模型研发和运营人员提供理论培训和跨学科知识,并探索共同研发基本大模型的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相关课程和培训项目,继而实现学校与企业的优势互补,使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实现更好发展。另一方面,全面推动大思政课资源共享。思政课是高校开展意识形态教育和防治的主要阵地。建立大思政课资源共享机制,采用相同的标准建立数据库,共享与意识形态和思政课相关的数字信息、工作经验,共同研究解决相关热点问题,实现数据、信息、经验等数字资源的互通,打造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治理共同体。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32.
- [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115.
- [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78.
- [4] 杨超.5G赋能:红色文化传播增添新动力[J].人民论坛,2020(8):136-137.
- [5] 马昕.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对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影响、挑战及其应对[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170-176.

(下转第51页)

质量评价体系研究[J]. 高等职业教育探索, 2023, 22(5): 8-14.

[9] 姜大源.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逻辑起点与制度创新[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5(1): 5-12.

[10] 陈晓明, 刘宝民. 模糊综合评价法在职业教育质量评估中的应用改进[J]. 教育与职业, 2024(15): 83-89.

[11] 洪霄, 张文明. 数字化治理视角下高职产教融合评价体系的建构[J]. 江苏高教, 2023(12): 105-112.

[12] 查安平, 邹心怡. 基于 OBE-CIPP 模式的知识技能与课程思政融合的高职院校课堂教学评价体系与实践研究[J].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5, 24(2): 108-114.

[13] 周俊, 马世澎. SPSSAU 科研数据分析方法与应用[M].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24.

[14] 周光礼, 武建鑫.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等教育评价改革的逻辑与方向[J]. 中国高等教育, 2025(2): 43-48.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Evaluation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ZHENG Jian¹, CHEN Feng-zhen¹, CHEN Li-li²

(1.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Meizhouw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Putian Fujian 351111;
2. Fuzhou Anboro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Fuzhou Fujian 350003,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poses new challenges and requirements for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for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guided by the "Five Dimensions" principle (political height, humanistic temperature, systematic depth, problem-solving intensity, and evaluation validity). It integrates a multi-layered structure (goal layer, criterion layer, index layer, method layer, data layer, analysis layer, feedback layer) through a "Three-dimensional Integration" model (system dimension, logic dimension, cognitive dimension), and introduces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and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 to quantify indicators. Empirical analysis conducted on the "Six Clouds" platform (Fly Inspection Cloud, Teaching Cloud, Training Cloud, Internship Cloud, Employment Cloud, Labor Cloud) verifies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the system. This study provides an evaluation paradigm and practical path for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Key words: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digital quality evaluation; AHP-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责任编辑: 桂彬彬)

(上接第 44 页)

A Critical Review, Paradigm Re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Path of Ideological Risk Governanc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Era of Large Models

LIANG Li

(School of Marxism,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anzhou Gansu 730101, China)

Abstract: The digital revolution driven by large models has profoundly reshaped ideological governance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s an emerging technological paradigm, these large models are increasingly embedded in university ideological risk management systems, making it crucial to analyze their practical implications, challenges and significance. Their advanced human-like cognitive capabilities are redefining governance paradigms through innovative thinking patterns, upgraded digital platforms, and expanded governance domains. To address the risks posed by large models' technical mechanisms, a three-pronged strategy is essential: proactive stakeholder engagement,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is approach aims to enhance digital literacy among university administrators, establish intelligent cybersecurity frameworks, strengthen multi-stakeholder governance systems, and refin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for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These measures collectively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risk management in the era of large models.

Key words: era of large models; ideological governanc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risk governance; innovative path

(责任编辑: 陈思婷)